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序　言

在《李达军事文选》即将出版之际，让我写几句话，我是很乐意承担的。我认为，这本文选总结了历史经验，为我军建设又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李达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担任过各种重要的领导工作，他建树的革命业绩是多方面的，但人们往往用“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来概括李达同志的特殊贡献。我想，这首先是因为他的大部分经历都离不开“参谋长”的岗位：在红军中担任过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的参谋长；抗日战争期间，1938 年 12 月接替倪志亮担任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尽管他还先后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兼任过云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和国家体委的副主任等等，但给人的印象最深、时间最久的仍是一个“老参谋长”。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人们说李达同志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还因为他长期辅佐刘伯承、邓小平，是刘、邓身边的好参谋长。李达同志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军事家直接领导下前后工作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正是军事斗争十分严峻复杂、我军战略战术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的年代。作为参谋长，在刘邓指挥的许多大小战役中几乎都倾注着李达同志的心血。也正是作为刘、邓的参谋长，他在自己著述里的很多方面反映了刘、邓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以及克敌制胜的军事辩证法。这也是本书所收的文章的价值所在。我同李达同志自在援西军、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建立以后就接触越来越多，他的好思想、好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他身上最突出的是政治强和业务精。他事事按党的政策办事，吃苦在前，不计名利，严以律己，处事公正求实，深受同志们的敬重。他热爱本职工作，善于接受新事物，精通业务，特别是做到知已知彼，能及时向领导提供可选择的方案，深为刘、邓所器重。我以为，像李达同志这样的好领导、好党员、好干部，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其它各条战线上，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今天新的长征路上，都是广大干部的好榜样！我相信，这本内容丰富的文选必将对广大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产生积极的良好影响。

宋任窮

李达军事文选

忆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前后

1934 年盛夏时节，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于 7 月 23 日命令红六军团担任前导，退出湘赣边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与红二军团（当时改称红三军）取得联系。红六军团当时共有 9700 余人，由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王震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8 月 7 日，我们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艰辛的西征之路。12 日，我们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的胜利，并由任弼时宣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委。但是，军委向我们下达任务时，并没有明确红六军团是作为总部的前导，为红军主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让我们到湖南去找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且非常准确。我很奇本篇是李达同志 1979 年为纪念贺龙同志逝世 10 周年而作，后经修改充实，发表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 红军长征 ” 卷。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 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 ”，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我们也才知道，红六军团在受命寻找红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

一

直到 9 月 26 日，朱德同志给“ 任、萧、王 ” 发来“ 火急 ” 电，我们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行动目标。电报说：“ 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恩南、印江、清江并向石吁方向前进。 ” 并确定我们的路线：“ 由现地域或经清江、青溪、恩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 ” 依据这一指示，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率领部队，与追堵我军的湘军、桂军巧妙周旋，且战且走，途经湖南、广西，进入贵州。10 月 3 日，军委电示任、萧、王：“ 桂敌现向南开动 ”，“ 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 1 日 13 时来电令，迅向江口前进。 ”4 日，军委又电：“ 黔敌柏辉章师现分驻松桃、铜仁附近，另一部正向我贺部追击，其兵力正形分散。我六军团应乘此时机，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并相机攻击堵敌部队。 ” 为执行军委上述指示，军团首长命我带领由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和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担任前导任务。我们 6 日进至石阡地区，7 日继续行军至甘溪，与桂军廖磊所部第十九师遭遇。原来，桂敌并未“ 南下 ”，而是一直在追踪，当发现我们之后，突然抄后路，切断了我们与主力的联系。由于当时我们以为桂敌已经南撤，只顾向江口急进，和红二军团会合，所以没有和桂军作战的思想准备。加之，我们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事先也没

有得到情报，待发现桂敌的前卫部队时，已经深入湘、桂、黔 3 省敌军 24 个团的重兵包围之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指挥先头部队与敌军奋力苦战，坚持到黄昏之后，我带着机枪连冲出敌围。其余部队也相继冲了出来。我清理了人数，只剩下第四十九团、五十一团的两个团部和机枪连，总共 400 人左右。许多同志在突围中失散了。我们从一个叫作大地方的镇子，钻进了山沟。所幸这一带林深草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我们同敌人周旋了两昼夜，终于摆脱了他们的追击。我们与军团首长失掉了联系，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我和第四十九团政委晏福生、第五十一团团长苏杰等同志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折回去寻找主力部队（主力也不会停留在原地的），则很可能在途中重陷敌围，亦有被歼危险。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寻找红二军团，而据当地者乡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距江口、印江只有三五日行程。如果我们能很快找到红二军团，请求贺龙同志派部队接应红六军团主力，比我们这 400 人的作用要大得多。于是，我们在无法与军团首长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先寻找贺龙同志。我们把剩下的这部分人临时编成了 1 个先遣支队，直奔北方。10 日到江口时，没有发现红二军团的踪迹。于是，11 日经德旺，12 日沿梵净山西麓继续寻找。在甘龙口附近，我们听老乡说，这一带常有部队活动，既不像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像土匪。对于梵净山，我是早闻其名的。它位于江口县北、印江县东，海拔近 2500 米，山势奇伟，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森林，人迹罕至，是历史上土匪出没较多的地方。为不致弄错，我又找了些老乡，仔细地询问了一下。从他们提供的零星情况来看，在梵净山西北一带，很可能有红军活动。10 月 15 日，我们又进一步打听到，在沿河县一个叫枫香溪的镇子附近确有红军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兴奋极了，忘记了连日的辛劳，恨不能立刻见到他们。我重新整理了部队，就直奔枫香溪。经过来安营，又走了大约半天的路程，就看见一座小山头，上面有部队在活动，都是老百姓的打扮。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我们。由于我们红六军团穿的是制式军装，事先又未联系，他们误以为是黔军又来搜山，就作出了戒备行动。为避免发生误会，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我观察对面山上这些老乡打扮的部队实施戒备动作时，很像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所以断定他们就是红二军团的部队。于是，我就派人向他们喊话：“ 我们是红六军团，从根据地出发，来找你们会师的。不要误

会——”“ 你们是红二军团吗？我们是来找贺龙总指挥的——”喊了一阵，对面山上派人来跟我们接头。我取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垫着文件包，匆匆写就一封信：“ 贺总指挥：我们是红六军团，奉军委命令，从湘赣边根据地出发，前来寻找红二军团会合的。我是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面，希望同您会面。”我将信折好，交给来人。他们走后，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对于贺龙同志，我虽久仰其名，但从未见过面。他是否知道中央派红六军团来会合，我也拿不准。如果接不上头，或者虽然接上了头，但不能马上派援兵，我这个参谋长怎么对得住正率部队浴血苦战的任、萧、王首长呢？我正想着，忽见山上下来几个人，朝我疾步走来。最前边的一位，身材魁梧，头带礼帽，脚踏草鞋，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深灰色的衣服。他走到我跟前，笑着伸过手来，我迎了上去。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贺龙。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我们十分欢迎。你们辛苦啦！”他拽着身旁一位瘦削而精干的中年人，说：“ 这是我们的政委关向应同志。”关政委也热情地同我握手，并亲切地说：“ 李达同志你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辛苦了！弼时同志来了吗？”我说：“弼时、萧克、王震同志还在后边同敌人作战。”贺龙、关向应同志听罢，立时紧锁双眉。贺龙对我说：“李参谋长，你先把队伍带上山休息。”“我还是先向您汇报部队被围的情况吧。”于是，我边上山，边向贺、关首长汇报了红六军团寻找他们的经过，特别将我们在甘溪遭到敌军袭击的情况，详细他讲了一遍。贺龙说：“你们遇到的是桂军，看来还有湘军和黔军，能突围出来，很不容易。黔军也天天在找我们。刚才你们到山下，哨兵还以为是他们来了。我观察了一下才知道是你们红六军团。我们这几天就是出来接你们的，现在真的碰到一块儿了。”我说：“贺总，我是找您搬救兵去接应主力的。”贺龙爽快地说：“好！我们研究一下，做些准备。”他用力一挥右臂，对部队说：“明天就出发，接应六军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龙同志。他那平易近人、豁然大度，在危难之时毫不迟疑地援救兄弟部队的豪爽气概，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还萦绕在眼前。

二

第二天一早，贺、关率领部队，兼程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我们这支先遣队仍然担任前导。途中，我们了解到红六军团主力已经摆脱敌人，朝梵净山方向去了。我们又折回来，大约转了一两天的样子，在梵净山西南发现一支部队，经用军号联系，原来是郭鹏、彭栋材同志率领的第五十团。我给他们介绍了贺、关首长，他们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淌下了热泪。第五十团的同志们争着同贺、关首长握手。许多同志拥抱在一起，不知说什么好……。郭鹏、彭栋材同志说，他们团同主力失去联络后，既无地图，也不知道红二军团的位置，转了好几天，偶然从一个破纸堆里翻出半张旧报纸，上面登着贺龙所部在“沿河、印江一带骚扰，向西南方向蠢动”的简短消息，这才有了具体目标，一路找来，果然同你们相遇。我们稍事休息，便一同沿梵净山西麓向北继续寻找红六军团主力。大概又转了一两天，终于 10 月 24 日在木黄找到了他们。两个军团的同志虽然以前多不相识，见了面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握手，拥抱，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小鬼们手拉着手，又蹦又跳，高兴极了。我陪着贺、关和任、萧、王首长亲切交谈。贺龙特别兴奋地说：“我早就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因为电台坏了同中央断了联系，不知道你们的具体位置。这下可找到你们了。看见你们安全脱险，我也就放心了。你们来自井冈山，来自毛泽东身边，可要好好给我们介绍经验哪！”接着他和关政委关切地询问了红六军团脱险经过。王震政委见了我，百感交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谁知道你真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你这个参谋长还不错嘛！”任、萧、王首长经过十几个昼夜的辗转奔波，疲劳过度，特别是任弼时和萧克同志已经走不动路了。贺总派了两副担架，抬着他们行军。在行军途中，王政委跟我说，10 月 7 日在甘溪时，被敌人截成了三段。他们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在高山临时开路，行军一昼夜，到达包溪。我第十八师和敌军打了半天。他们走到路腊，又遇到敌人，我尖兵缴了敌人 6 支驳壳枪，主力仍在高山与敌人对峙。这时，已经减员六七百人。到了 12 日，为了避免被敌人追击，行动方便，他们将主力分为两个纵队，烧掉了不必要的行李。经过施秉附近时，又被桂敌追了 20 余里。　10 月 15 日，他们向板桥前进，准备渡石阡河。但敌李觉部已先到板桥堵击。他们避开敌人，又折返甘溪，第五十二团在龙塘被敌截断，又退至白沙方向。17 日晨，他们到达甘溪。午后，强行通过了敌军在石阡、镇远

设置的封锁线。这样，经 10 余天转战，终于摆脱了敌军，在印江县的木黄同我们相遇。弼时同志身患痢疾，还手拄木棍，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行军。听了这些，我非常感动。回想起甘溪遭遇战，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红六军团被桂、湘、黔 3 省联军重兵包围分割，仍能各自为战，杀出一条血路，同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这是与任、萧、王首长平日对部队的培养、训练，和临战时的机智指挥分不开的。后来，我曾读到两份敌军总结为何未能追上红六军团主力的材料。其中一份是湘军旅长胡达的谈话。他认为所以未能追上和消灭红军，是因为这个部队确有一些“长处”，“如服从命令，拥护首领，完成任务，动作迅速”，“比如遇到国军，该部因避战之故，马上前卫变作侧卫或后卫，其最大目标，突然不见了”，“该部对于其主义，信仰极深，故拥护首领，甘心效死疆场。”另一份则是白崇禧对桂系十五军的训话。他说红六军团的长处，“第一是纪律严格，进退动作一致，奔驰数省，队伍完整；第二是组织严密，党的命令，可直达士兵下层；第三是行军力强，该部没有落伍心。”至于桂军为何没有追上红六军团，他认为是由于桂军存在四条“短处”：“第一行军弱，有些官兵不能走路……这次追赶萧克，暴露了这种弱点；第二是有少数的官兵胆小，借故落伍，不肯上前；第三是后方勤务不好，行动不敏捷；第四是通讯不灵”。红军的长处，当然不止于此。但从敌人公认的这几点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部队在西征中表现出来的顽强奋战的战斗作风和精神风貌。当然，我们的胜利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损失是很大的。先烈们的鲜血，换来了宝贵的经验，鞭策我们幸存者更加谨慎、周密，更加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去战斗。

10 月 25 日，红二、六军团在向南腰界转移途中，任弼时、夏曦、贺龙等首长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商定了两个军团集中行动的方案，于当天电呈军委说：

“六军团现只有五十二团 800 余人未到，其余已集中编成 3［个］团，总数约 3000；二军团为七、九两师，总数约 3200，精良充足，但子弹缺乏。

“任与夏、贺商议，二军团以下七、九两师编成 3 个团，独立师编 1 个团，共 4 个团；六军团暂编 3〔个〕团。两个军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二军团。任、萧随二军团，夏、王、李随十七师。

“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向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2〕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贺总和关政委对六军团非常关心，多次指示二军团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照顾好六军团，保障好六军团。二军团的指战员，按照贺、关首长的指示，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筹粮、送肉、送盐，组织人上山选割细软的茅草，给我们当铺草；给我们营以上干部配备了乘马，还拨给我们七八挺轻机枪。这些无私的援助，感人至深。

10 月 26 日，二、六军团在南腰界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标志着两个军团胜利地结合在一起。

三

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在红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说二军团，由于夏曦同志盲目地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在部队中搞肃反扩大化，屈杀了一大批好党员、好干部，甚至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3〕；在军事上，亦曾犯过盲动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使部队和根据地受到了很

大损失。二军团的电台坏了以后，同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中央对二军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夏曦当时的职务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又一直不承认他的政治错误，以贺龙、关向应的身份，是不能左右夏曦的。六军团出发前，任弼时同志即已受命于中央，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前往解决二军团的问题。

再说六军团，经过近 3 个月的远征，中途几遭敌军重兵的追、堵、截、围，部队严重减员，疲惫不堪，只剩下 3000 人左右，其中还有 300 多伤病员。会师前，为了轻装，连行李都烧掉了。因此，我们亟需休整、补充。

正如贺龙同志所说，“ 我们二、六军团两个军团会师以前都是多灾多难的，肃反都扩大化，干部损失最大。所以，两军都希望会师。六军团需要休息，二军团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 ”“ 如果没有（黔东）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丢光了，很狼狈。 ”

但是，由于军委负责同志不了解上述情况，于 10 月 26 日急电“ 任、萧、王 ”：“ 一，二、六军团合并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军团仍应独立的依中央及军委的指示活动、发展，并接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

二、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六军团所携的两个电台，如能修好，并配好材料，望留一个及译电人员给二军团。 ”

二、六军团首长，包括夏曦在内，接此电今后，都认为二、六两军团在目前情况下是不能分开行动的，因此不同意分开。为让中央及军委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先于 27 日汇报了夏曦在二军团（即红三军）所犯的严重锗误：“ 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离开湘鄂西苏区时，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在肃反中［把］9/10 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最近到白区配合迎接六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曦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苏区缩小到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 30 里，人口 3 万余人；20 个区缩小到 12 个区；地方武装扩大的 3000 多新战士，缩小了一半…… ”由于夏曦同志“ 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军委会主席 ”，“ 并提议贺龙为分军委会的主席，萧、任副之。 ”第二天，“ 夏贺关任萧王 ”又电呈军委，详细申述了两个军团需要统一行动的理由：“ 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记得这样反复了几次，军委才同意二、六军团共同行动，调夏曦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后，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关于二军团的政治路线问题，由于贺龙、关向应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夏曦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得到纠正，并于 6 月中旬恢复了党团组织。只是党团员敢于站出来登记的还不多。弼时同志到二军团了解情况后，对夏曦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促进了二军团的政治生活迅速走上正确的轨道。两个军团会合后，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统一指挥二、六军团。贺龙对六军团是非常尊重的。他曾带着二军团的一部分干部到六军团来学习，诚恳地对萧克和王震同志说，你们军团来自中央根据地，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军事素质普遍比较高。二军团的干部，大部分在肃反中被错杀了。新提起

来的干部，特别是营团级干部，素质差，经验少。希望六军团能支援二军团一批干部。萧克、王震同志欣然同意，立即选调了一批同志到二军园工作。如甘泗淇、方理明、张平化、袁任远、余秋里、朱辉照、洗恒汉等同志就是这时调到二军团的。萧、王首长对二军团的能征善战也十分钦佩，要求贺龙、关向应调了一批军事干部到六军团工作。贺龙同志还请弼时同志给二军团介绍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介绍中央红军反“围剿”和土地革命的经验。贺总听说我懂得一点儿军事训练和参谋业务，也曾经让我给二军团的干部讲课和做示范动作，还叮嘱我帮助二军团司令部搞好业务建设。不久，又调我担任二军团参谋长。这样一来，二、六军团就融合在一起了。大家互相敬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如兄弟一般，无形中增加了几倍的力量。贺龙同志说：“二、六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个会师的模范。”为策应长征，我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敌人发动了攻势，在运动中歼敌数千，相继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地，于 11 月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任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贺龙任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又于 1935 年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1 月 19 日，两军团主力由桑植出发，又走上了伟大长征的新阶段。注　　释〔1〕1931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简称“中革军委”。〔2〕乾、松、凤地区，指地处湘黔边界的湖南省乾城县（1953 年改名为吉首县），贵州省松桃县（1956 年与铜仁、江口两县部分地区合并为松桃苗族自治县），湖南省凤凰县。〔3〕 1933 年 3 月 24 日，夏曦以“改造党不能依靠旧的干部”为由，不顾许多同志的反对，作出了解散湘鄂西地方和军队中党、团组织的决定，红二军团中的政治机关也被取消。誓师抗日东渡黄河

三原誓师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触发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8 月 6 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地区，整装待命。我们援西军〔1〕此时正驻在甘肃省镇原县的屯子镇地区。接到命令后，8 月 7 日，援西军由司令员刘伯承同志率领，从屯子镇出发，路经甘肃省的西峰镇、宁县，陕西省的旬邑、淳化等地，于 8 月下旬，到达陕西省三原县城以西的石桥镇。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结果，颁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又称第十八集团军），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 3 个师。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于当天发表了就任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通电。我们援西军改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同志任师长、徐向前同志任副师长，张浩同志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同志为副主任，倪志亮同志任参谋长。当时，我担任参谋处长。这篇文章是李达同志 1980 年应《刘伯承回忆录》的编者之约而作，该书 1981 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援西军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罗炳辉同志领导的一支队伍）组成。改编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编为第三八五旅的第七六九团、第七七〇团；红三十一军的第九十一师、第九十三师改编为第三八六旅的第七七一团、第七七二团。陕北红军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独立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

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还有一部分干部编成了教导团。全师共 13000 余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第三八五旅除第七六九团外，连同师属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营、工兵营，脱离本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的，计有 9160 余人。部队整编完毕，准备 9 月 6 日召开全师指战员奔赴抗日战场誓师大会。徐向前副师长和倪志亮参谋长尚在延安，此时还未到职。刘师长和张浩同志指定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同志担任誓师大会的总指挥，要我协助他工作。刘师长特别嘱咐我们说，这是我们一二九师第一次阅兵，也是我们开赴前线抗日的第一次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一点，但要庄严；主要是把部队组织好，要造成抗日救国、杀敌立功，为挽救祖国的危亡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气氛。我们选定了石桥镇附近的一片空旷的田野，按陕西的习惯，叫作“ 休闲地 ”。这片小“ 广场 ”面积不小，是作会场的理想地方。按照刘师长的指示，我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我组织师直属队的一些同志搭检阅台。这检阅台很简单：先用四根木桩埋到地里，然后在上面架上几块木板。在这个简单的检阅台的四根立柱上，又贴上了几条标语，烘托着会场的气氛。6 日清晨，我们刚刚通知各部队到会场集合，天空中乌云密集，随着阵风，零零星星地下起雨点来。看样子，这雨是要越下越大。这时，驻地离会场近的部队已经到了。陈赓同志和我看雨暂时停不了，就商定，先让部队回营房待命，再请示刘师长可否将誓师大会改期举行。说罢，我们便上了马分头通知已经进入会场的部队。刚好，刘师长和张浩主任骑着马到会场来，和我们走了个迎面。他们没有穿雨衣，身上都淋湿了。一见面，刘师长就问我们：“ 怎么部队又往回走了？ ”“ 报告师长，因为下雨，我们想请示一下誓师大会能不能等雨停了再开？ ”我们回答。“ 不行！ ”刘师长干脆而又坚决地说，“ 军人嘛，就是要风雨无阻，定了的就不能随便改。今天是我们出师抗日的誓师大会，更不能改，要按时举行！ ”“ 是！ ”陈赓同志和我马上按照刘师长的指示，又分头去追赶往回走的部队……刘师长这一年 45 岁了。这个年纪虽然并不算大，但在我们这些三十几岁的人看来，他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川军中的一员名将，以带兵严格、骁勇善战著称。从他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时起，多年担任红军参谋长之职，1928 年到 1930 年，曾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研读军事学。他性格坚毅，对部下要求很严。他平时总是讲，作为一个军人，就要风雨无阻，有一股无往而下胜的气概。尽管我们早就了解这一点，但这一回我们的体会却更为深刻。这次雨中誓师，场面庄严、壮丽。近万人的队伍，分列在检阅台的四周，队伍又长又宽，摆了方圆四、五里，一眼望不到头。那时还没有什么军乐队，我们就把号兵集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临时的“ 军乐队 ”。雨果然越下越大，到临开会时，已经是倾盆而泻了。师首长们在大雨中泰然自若地站在检阅台上，宛如一株株挺拔的松树。首长的以身作则，感染着全师将士。全师指战员整整齐齐地列队站在雨中，秩序井然，上万颗红星帽徽在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红光。干部、战士一个个英姿焕发，等待着师首长检阅。陈赓旅长宣布誓师大会开始，请刘师长讲话。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就是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后，我军从上至下，都要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标记。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换帽子和帽徽。这对于红军广大干部战士来说，可谓一大转变，一时很难接受。有些战士听说要换帽子，心里非常憋气，在睡梦中还常常哭醒。不少同志说：过去我们是打白军的，现在我们自己却戴上了白军的帽子，接受不了。还有的同志一时

冲动，甚至要求退伍不干了……经过各级党、团组织做工作，部队中的一些糊涂想法虽然消除了，但在感情上，是难以转变过来的。为此，刘师长在讲话中，特别讲了换帽子的问题。刘师长向前走了几步，开始讲话：“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开赴抗日最前线的誓师大会。 ”他魁伟的身躯，昂然屹立在雨雾中，洪亮的声音压过了风雨的喧啸。接着，他简短地讲了全国抗日的形势，然后说：“ 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九师。 ”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音，激动地接着说：“ 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 ”说着，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用手指了指，“ 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说罢，他把那顶黄军帽戴在自己头上，然后发出命令：“ 现在换帽子！ ”一声令下，全师同志一齐从挎包里取出昨天准备好的帽子，又依依不舍地把红星军帽脱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挎包里。没有一个人把红星帽丢掉。换帽之后，举行授旗仪式，颁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纪念章。这时，同志们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 ”‘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紧接着，进行宣誓。誓词是这样的：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 6 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 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纪律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刘师长读一句，同志们跟着重复一句。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回荡在田野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心弦。这次雨中誓师的豪壮气概，永远印在全师将士的心中。

巧拒蒋介石的调令

誓师大会之后，9 月 16 日，一二九师奉命进驻陕西省富平县的庄里镇地区，准备向晋东南进发。一一五师向晋北进发，一二〇师开往晋西北。这样，八路军的 3 个主力师就可以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又能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而作出的战略部署。我师到了庄里镇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如军事训练、组织先遣队、进行侦察、了解华北地区的风俗习惯、进行政治教育等等。正当我师准备按八路军总部的预定计划，东渡黄河北上的时候，国民党驻西安的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我师。这是一位不速之客。我们既没有请他，师部事先也没有接到通知。值班参谋告诉我，乔茂才来到师部，自称认识刘师长，要求见。我想，刘师长早年参加辛亥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命，毕业于重庆将校学堂，曾在熊克武先生的部队任过团长。他是川军中被誉为“刘伯温”的有名的常胜将军，知道他的人一定不少。这个乔茂才可能在四川时跟刘师长共过事，也许他仅仅见过刘师长的面，或者只不过闻名而已，到底见不见他呢？我立即向刘师长报告了此事。刘师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还是先弄清来意再说吧。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我领会了刘师长的意图，便来到师部那间简陋的会客室。我打量了一下这位不速之客。他年纪约有 40 多岁，头戴礼帽，身穿便服，见我来了，立刻起身相迎，伸过手来，自我介绍说：“乔茂才，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我叫李达，参谋处长。”我说了这么一句，跟他握了握手，算是礼节。“唉呀，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到现在还没回来。”乔茂才露出着急的样子，问：“那几时才能回来呢？”我说：“很抱歉，刘师长行前没有说回来的日期。”接着就是一阵沉默。我想：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反正你总得讲话。果然，干坐了一会儿，乔茂才终于沉不住气了，说：“李处长，我此次来贵师，一是来拜访，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您可否转告刘师长？”

我说：“这几天，刘师长正忙着到部队交代准备出征的事，行踪不定，一时很难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等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

告。”乔茂才打开随身带的公文包，取出一封信来递给我说：“请李处长先过目。”我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命令的大意是，要一二九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我边看，乔茂才边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贵师到了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息一段了。”我看过后，觉得这个命令大有文章，就问乔茂才：“蒋委员长的命令，朱德总指挥看过没有？怎么我们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我想，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就把它还给了乔茂才，说：“乔参议，这个命令还是等刘师长回来交给他为好。我先给你找间房子，休息一下。我这就去找找刘师长，请他尽快回来，您看怎样？”乔茂才不得不表示同意。我也就趁机辞了出来，把这个情况向刘师长作了汇报。刘师长沉吟了一下，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不是找我叙旧，而是要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他边说边走到地图前边。“一一五师已经到了灵邱、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一二〇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活动。日本鬼子呢？9 月 13 日占了大同，以 20 万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几个方向推进。照国民党这种打法，用不了几天，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我们师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我们同一一五、一二〇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本人切断。”“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而目前按我们实际情况恰恰应该尽量避开正面防御。”我插了一句。“这是个大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啊！我要马上报告朱总司令。”“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我问。“看来，他已经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我不能见他。你就说找不到我。过去我们是共过事，现在他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充当引我们上钩的钓饵。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么干，不符合这个协议嘛！我们不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就这样，第一天我陪他吃饭，散散步。第二天、第三天仍是如此。彼此再

没有什么话好说。过了几天，乔茂才看看刘师长就是不见他，心里也就明白了八九成。再等下去，更是自讨没趣。他为了下台阶，就对我说：“ 我还有事回去要办，等刘师长视察回来后，我再来拜访。 ”“ 既然乔参议有要事在身，我就不好留您了。 ”这位不速之客，就这样被送走了。他本想来一二九师显显身手，没想到碰了刘伯承的软钉子，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去“ 述职 ”了。以后，再也没敢来。蒋介石原以为乔茂才与刘伯承有旧，可以利用这个关系，作一作一二九师的文章，企图假日本人之手消灭之。结果是错打了算盘。蒋介石的阴谋被粉碎了。我师仍然按照原计划，东渡黄河，沿同蒲线北上。

东渡黄河

出发前，师里组织了一个先遣队，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七六九团组成。为了在师主力到达前搞清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先遣队由刘师长亲自率领，陈赓、陈锡联同志随同，9 月 24 日由庄里镇出发，比大部队先行一步。车运到晋北后，每到一地，刘师长都要亲自看地形、摸情况。行军时，他总是尽量向前靠。这已成了他多年来的习惯。我随张浩同志跟大部队走在后面。先遣队行军 4 天，到了韩城县的芝川镇。这里是黄河的一个渡口，河面宽，水流也较缓些。再往北 60 华里左右，就是著名的黄河龙门古渡口〔2〕。龙门是司马迁的故乡。在芝川镇南边，有司马迁的祠和墓，但是，此时谁也无心去光顾这些名胜古迹。大家心急如焚，只想早点找到船只，渡过黄河。但是，奇怪得很，参谋人员在河西岸都跑遍了，也没有看到一条船。究竟河西岸的船让他们弄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这么巧，偏偏八路军要过河的时候，竟然连一条船都找不到呢？这里面一定有鬼。一一五师首获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早已传到我师。指战员们求战心切，恨不能插翅飞到抗日前线去痛揍日本鬼子，怎么能让一条河拦住而耽误时间呢？刘师长更是十分焦急，马上派人去找负责芝川镇和渡口的国民党地方官。等把这两个地方官找来后，天已经很晚了。刘师长先是问他们为什么河西岸没有船？这两个人油腔滑调，支支吾吾他说：“ 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 ”不用说，这是含糊其词地搪塞我们一下。很难说这不是他们故意给八路军制造麻烦，好让我们承担贻误战机的责任。刘师长对这两个老奸巨猾的家伙非常恼火，气得使劲一拍桌子，厉声问道：“ 你们认识我吗？ ”那两个家伙摸不着头脑，连说：“ 不认识，不认识。 ”“ 这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一位参谋向他们介绍了一下。一听这个，两人的气焰收敛了。忙说：“ 刘伯承将军大名，我们早有耳闻，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 ”“ 啪！ ”刘师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语气十分严厉地说：“ 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的命令，要渡过黄河去抗日前线的。我们必须明天拂晓全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给我调齐。不然我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 ”“ 当汉奸论处 ”，在那时就是枪毙的代名词。那两个家伙这时吓得脸都变了颜色，战战兢兢地答道：“ 我们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刘师长叫过两位参谋，说：“ 你们陪他们一块去找船吧。 ”这一着真灵，那两个家伙果然在个把小时就把所有的船都调到了河西岸。第二天，即 10 月 6 日，先遣队便渡过了黄河，比预计时间，晚了一天。事后，有几位同志问刘师长：“ 师长，我们可从来没有见你发过这么大的火啊？ ”刘师长说：“ 你们看，国民党政权腐败成了

这个样子，上上下下都是如此，还能不打败仗？我在旧军队里混过几年，知道国民党这些当官的脾气。他们欺软怕硬，看势头办事，何况这次是故意刁难我们。吓唬他几下子，他就知道八路军不是好惹的了。”说罢，刘师长和几位同志会意地大笑起来。注　　释：〔1〕援西军：　1936 年 10 月，红五军团、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转战于河西走廊。因敌众我寡，处于危险境地。为援助西路军，中共中央和军委 1937 年 2 月令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组成“授西军”，从陕西三原、淳化出发，西进救援。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2〕龙门古渡口，又称禹门口，在陕西省韩城县和山西省河津县之间。记辽县游击训练班

1937 年 11 月上旬，日军攻占太原以后，在华北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基本崩溃，先后退到了黄河以南。嗣后，日军便肆无忌惮地向河北、山东等地进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我党我军，庄严地向全体华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等口号，为收复国土，领导民众反抗外来的侵略而斗争。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刘伯承师长认真总结了一二九师出师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及日军的作战规律。并对一二九师的同志作了《游击战术》的报告。太原失守后的第三天，我八路军总部决定一二九师到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11 月 13 日，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的石拐镇召开党员干部大会，由刘师长作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并传达了毛主席给八路军各师所作的具体指示。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今后全师的任务：即按照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刘师长说：“党中央、毛主席让我们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现在，我们就要在太行山上来一个麻雀满天飞！”这是李达同志 1981 年为《刘伯承用兵录》撰写的文章。该书 1982 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会后，一二九师的同志对于今后的战略转变，有了较好的思想准备。但是，对游击战如何打法，游击队如何组织，还是一个新课题，为了使同志们明确打游击的具体搞法，师部决定，举办一个游击训练班。刘师长选中了辽县作为开办游击训练班的地点。11 月 15 日师部在辽县〔1〕西河头村安营，训练班就设在附近的石匣。第二天刘师长召集司、政机关的有关同志，交代了抽调人员轮流参加集训班的事。他说：“今后华北抗战的重担，就要落在八路军的肩上了，所以我们办训练班是非常重要的。参加学习班的干部，一部分要从已经派下去的游击支队中抽上来，学习完后再回去；另一部分从主力部队抽，学习完了派下去建立新的支队，或派到已有的支队作骨干。你们好好商量一下，作个计划，争取一年内轮训一遍。”按照计划，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分成两部分，课程略有区别。一部分是师属各部队排以上的干部，学习的内容是如何分散到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打游击；一部分是地方上县、区级干部，他们的学习内容是如何组织自卫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打击日本侵华军，以及组织好支前工作。那时，有些同志对打游击战还很不了解。他们只愿意在一地打仗，不愿意走路。有的则说：“游击游，脚板走出油；运动战，大米小米啖。”还有的说：“一年来都说打日本，为什么打一下就又拉走了？”这些，都是要在训练班里解决的思想问题。刘师长针对部队的现实状况，敌人的战术特点，和我们的作

战经验，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论游击战和运动战》等讲稿，结合半年来的实践事例，亲自给训练班的学员们讲授。我记得刘师长在讲集结与分遣的“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战术原则时，举了“黄蜂围攻战马”和“打麻雀仗”的例子。他说：“你们回去，首先要组织游击队、自卫队，普遍分散到各地。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大量分散的抗日武装去消耗日军集结来进攻我们的兵力，掩护我们的主力集结去歼灭敌人分散的部队。只要我们打得巧妙，我们一连人就可以箝制日军一个营或一个团，甚至更多。”接着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战例说，1937 年 11 月 26 日的范村战斗，敌人以五六百步兵、一连骑兵、6 门迫击炮和 2 辆汽车向我进攻。七七一团一连则把全连人分散在十余里广阔地面上，从四面八方准确地向敌人射击。敌伤亡近百人，汽车被我打毁 1 辆。从此，我们就运用了“麻雀仗”，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麻雀仗，有时，一只麻雀也闹得敌人团团转。汪乃贵支队有一个战士执行送信任务，走到上龙泉附近，遇到了 100 多鬼子。他就迅速躲在一个石洞里，沉着地向敌人射击，一连打死十来个鬼子，鬼子却没有办法打到他。后来鬼子就让汉奸出来诱降，这个汉好又差点被击中。敌人围着石洞转了半天，也无计可施只好撤走。我们的这位战士也安全归队了。

刘师长又说：“有了游击队、自卫队组织之后，就要武装起来。

用当地的各种武器，如土枪、土炮、地雷、红缨枪、大刀等进行训练，做到有大刀会砍，有红缨枪会刺，有地雷会埋。我们不是天天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口发银光’吗？俗话说：‘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蜂不可侮！’这蛰就是它的武器。有一次我和李达同志骑着马在山坡上走着，他的坐骑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我的马也象受到传染一样，四蹄乱蹦。一刹间，两匹白马拼命向前跑去。我们使劲抓住缰绳，才没有摔下来。警卫员很着急地从后面追了上来。等我们各自勒马站定，才顾上互相问一问，这马为什么突然受惊了？警卫员说：‘刚才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螫痛了。’”

刘师长接着说：“你看，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并且懂得游击

战术，会从马的屁股后头来攻击，弄得这个庞然大物用尾巴扫也来不及，被螫得遍体伤痕，过后半天还痛苦不堪，心有余悸。敌人来进攻的时候，对他的行军纵队，不也是打尾最好吗？因为眼睛是长在前面的，对后面的注意就差。”刘师长又列举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事例来说明，他说：“推翻秦朝暴政，就是陈涉首义，群雄蜂起嘛！现在我们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也是民众蜂起嘛！民众武装起来，到处象黄蜂用自己的蛰去螫庞然大物一样，到处打击敌人，敌人总有一天要化脓吐血而死。”学员们听了，都活跃起来，认为刘师长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听就明白。“麻雀战术”和“黄蜂战术”在学员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8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发表后，使学习班的讲课内容大为丰富，游击训练班的学习，每期多则一月，少则半月。虽然学习时间很短，学员们都感到有很大提高。有些同志来时，不愿意打游击；毕业时，就积极要求下去打游击了。从此，大家都以被派出去打游击为荣。学员们毕业以后，就被派到各地，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壮大游击队。地方干部则回到本地，以区、村为单位，组织群众性的自卫队。有的就补充到已经成立的游击队里作骨干。他们刚下去时，往往只带三五个人，或一个班，多的有带一

个排或一个连。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这些游击“种子”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二九师的游击队训练班，后来演变成参谋轮训班、随营学校，简称“随校”。辽县这个不为人注意的偏僻的小山城，就这样成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发祥之地。据统计，从 1937 年 11 月太原失守前后，到 1938 年 4 月反敌九路围攻〔2〕时为止，一二九师曾有步骤地分遣了 2/3 兵力（当时 64 个连队，派出了 41 个连队）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这里，举几个游击队打鬼子的例子，来说明辽县训练班是卓有成效的。如秦基伟、赖际发支队破路劫车就是一例。他们在寿阳、榆次一带和石太线上炸桥拆轨，“捉火车头”（使火车出轨）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还分遣了许多由二三人组成的小组，散伏在敌长凝〔3〕据点周围，日夜打冷枪。敌人被围在长凝，甚至都不敢上厕所和挑水了。太原失守后，正太路敌人的火车正值大忙的时节，三八五旅的一个游击队乘敌人警戒疏忽之时，以一个连进行夜袭。敌人死守在站房里不出来，游击队毫不客气、一阵手榴弹投到站房里，17 个鬼子、19 箱军用品和枪支同归于尽，车站也被烧毁。敌人立即由石家庄运来一车皮兵增援，又被我解决了。等到日军的又一批援兵赶来时，我们的部队已迅速地撤上山了。汪乃贵支队有一个打昔阳汉奸的故事。昔阳有一个汉奸，非常狡猾，日本人亲自来找，才肯出来接头，平时躲起来不敢露面。汪支队有几个人就找了几套日本军服，装扮成日本军官，到了那个汉奸住的地方，嘴里叽哩哇啦地乱嚷，要人给他们当翻译。那汉奸果然就迎出来了，当场就当了俘虏。这些游击小组象黄蜂和麻雀一样满天飞，闹得日本侵华军如芒在背，似鲠在喉，坐卧不宁。敌酋们非常害怕刘师长的“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战术原则和“麻雀战术”、“黄蜂战术”等，他们在失败之余，不能不哀叹：“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击是风。”“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八路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敌酋们不得不竭力来研究刘伯承同志写的《游击集团》、《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论著，并要他们的正规军也来学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提出“以子之略，攻子之略；以子之术，攻子之术”。然而，这些异族侵略军，既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又不熟悉地形。我们地广人多，他们防线宽兵力少，加上他们那股按操典行事的“牛劲”，学游击战谈何容易？等待他们的，只有彻底失败而已。注　　释〔1〕 1942 年 5 月 25 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辽县东南的十字岭地区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牺牲。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2〕反敌九路围攻，是指 1938 年 4 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 3 万余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地区。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总部特务团及部分国民党军队作战 20 余次，歼敌 4000 余人，收复县城 18 座，粉碎了围攻，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3〕长凝镇，曾为榆次县城，在今榆次市辖境内。

从收复黎城涉县战役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与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一、战役经过的概况

第一，沿潞城至邯郸线各大小据点之敌是谷口第一混成旅团。本师在奉到朱彭总副司令关于××区作战部署的××电今后，当即增调×××等部基干兵团以充实长治线之突击力量，组织 3 个攻袭集团由黄克诚、谢富治、徐深吉 3 同志分别指挥。在这些基干兵团尚未到达指定地及攻袭准备尚未完成以前（12 月 8 日至 13 日），当令潞城至武安线的所有部队并动员指挥沿线自卫队游击小组，向敌作不间断的破坏袭扰，以消耗迷惑疲惫敌人，以便主力在其掩护下隐蔽集结，各该部队在执行这一任务上一般的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6 日内（8 日至 13 日）全线小战斗合计共 73 次，埋设地雷 11 次（敌均触发），而敌人则无日无时不在用机炮猛射中，恐慌消耗之大可知。第二，14 日以后我大规模之动作准备均完毕。各路皆积极袭攻，如 14、15、16、17、18、19 等日×××部、×××部不断从路南伏 1939 年 12 月 8 日至 25 日，一二九师及晋冀豫军区部队，在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配合下，发动了邯（郸）——长（治）公路破击战。是役，我军收复了黎城、涉县两座县城，拔除日军据点 23 处，歼敌 700 余人。李达同志时任一二九师参谋长，这是他为此次战役所作的总结，经整理后发表于 1940 年 1 月 5 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击，袭击由潞城东退之敌，及井店镇、黎城停河铺、东阳关、响堂铺各据点敌，×之大部同时由路北袭击围击以上据点及运动中之敌；并先后埋设地雷 23 个，炸毁敌汽车 5 辆、大车 12 辆，敌死伤在 60 名以上。武涉线〔1〕上之袭击与破坏同样积极，特别重要的是× ××部 15、16 两日夜攻袭响堂铺，该地之激烈战斗确实截断了黎、涉交通，涉县两次出援之敌被我完全击退。最后并使敌人于 16、17 两日根本不敢出涉县城一步。由于以上的有力战斗给了敌人以莫大的震撼与痛苦，如各据点之敌每日夜不安宿，电话根本不通，抢粮部队不能出门，时有挨饿之苦，尤其慑于地雷之不意触发等等，以致迫使敌人不能不作逃命的撤退，成为收复黎城涉县的重要因素。第三，敌人遭受我以上之严重震撼后，促成了他的基础动摇，我部决于 22 日后施行全线的总攻击：（甲）22 日 10 时，我××部以一部及当地自卫队游击小组，由下桂花麦仑方面箝制黎城之敌，主力则分 2 路，经东西水洋向赵店镇迂回，×××两部之各一部则经岭东沟分 3 路直袭赵店镇，敌共 500 余人固守工事顽抗，入夜 22 时，我在统一信号之下一齐冲入该部将敌击退，我即刻占领该镇，并将附近碉堡及漳河桥星夜彻底破坏。23 日，××部主力转到上桂花麦仑分两路进袭黎城，××两部主力由董壁望壁亦分两路向黎城进袭，其他小部及自卫队佯袭停河铺，×××部之一部则由靳家集急袭戚里店， 15 时进入激烈战斗，往返冲锋 9 次，毙敌共 90 余人，伤亡奇重， 19 时敌不支向东阳关窜去，我当晚克复黎城，一面又以有力一部追袭东窜之敌。窜退东阳关之敌，在我追击部队赶到施行彻夜之袭击后，于 24 日拂晓狼狈窜退，东阳关同时被我收复。以上战斗共计毙伤敌约 250 余人，我负伤连排长 9 人、班长以下 35 人，阵亡连排长各 1 人、班长以下 31 人。缴获步枪 24 支，轻机枪 2 挺，各种子弹 7115 发，其他军用品甚多。（乙）响堂铺至涉县之敌，22、23 两日曾占领路侧要点掩护黎城敌人东窜，经我×××部及×××旅一部于 23、24 两日之夹击，敌极颓丧，我并以主力由西岗村分两路于 25 日夜突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